

「美」约翰·克萊夫 著

齐世和 温荣棉 李京 杨丽娟 译

于一 校

沉机喋血



天津人民出版社



沉机喋血

沉机喋血

〔美〕约翰·克莱夫 著

齐世和 李 京 译

温荣绵 杨丽娟

王 一 校

★

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

（天津市赤峰道130号）

天津新华印刷二厂印刷 新华书店天津发行所发行

★

787×1092毫米 32开本 7.625印张 2 插页160千字

1990年10月第1版 1990年10月第1次印刷

印数：1—4,600

ISBN7-201-00510-3/I·21

定 价：2.65元

序

希特勒的声音激动得发颤，他那先前恍惚不定的眼睛亮的象是得了热病。他在地下50英尺深的小书房里狂乱地跳着步，忘记了腿上的疼痛，疯狂地挥着手臂，就象在过去的大型群众集会上。

处决菲格莱因似乎暂时使他受到鼓舞并给他增添了新的力量。菲格莱因在明智地娶了爱娃·勃劳恩的妹妹格利特之后便成了他的亲信，没有参与任何阴谋，至少没有反对过他，但这并不重要。在地下避弹室的狂热的气氛中，仅仅不在场就是开小差，而开小差便可算作搞谋杀阴谋。

因此，菲格莱因这个前职业赛马师，靠狡猾的手腕和下流的诡计从赛马场爬上纳粹统治集团高位，只是因为呆在夏洛登堡区的家中而不是在地下避弹室里而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他被带到总理府花园里，被党卫队的卫兵枪决了，这里不仅成了他的墓地，而且也将成为那些刽子手的墓地。

他在说到希姆莱的叛国行径时又提高了声音。出自本能，他把他的秘书荣格夫人当成了听众，力图像过去对待成千上万之众那样对她行使权力。

荣格夫人飞快地在记录本上记着。她几乎不知道怎样才能跟得上他对最后两份文件的口述，那是他的政治和私人遗

嘱。在他看来，这两份遗嘱不仅是对以往之一切的庄严和恰如其分的解释，同时也是使纳粹哲学永存于世的手段。但是现在，他对现实世界本来就不稳固的统治已经崩溃，而他口述的许多内容都是重复和自责……他并没有错。

间或，在他私室里一间隔壁的屋子里有阵阵笑声传来，在会议室里举行的婚礼已经过去很长时间，现在，爱娃、鲍曼、戈培尔夫妇和冯·贝罗正在那间屋里边喝香槟边尽情地谈论着过去。

这次奇特的小型婚礼是由一位名叫瓦尔特·瓦格纳的人主持的，他是戈培尔的一个监察员并在市政府里担任某种名誉职务，因此他显然有权主持婚礼。他虽然身着纳粹党的制服，但除了戈培尔之外，地下避弹室里的人谁也不认识他，而且就象他神秘地出现那样，他随后便神秘地消失了。

随着俄国人的步步逼近，地下避弹室笼罩着一种期待和紧张的气氛，照明系统不断地出故障，周围时时陷于一片漆黑之中，一日三餐也失去了规律，人们完全忘记了时间。鲍曼的两只眼睛不断地朝门口瞟去。荣格夫人呆在书房里说明希特勒正在做什么准备。这会是最后的权力移交吗？他将扮演什么角色呢？希特勒是否希望自己的亲信助手留在身边一同殉职？鲍曼不想死，他对维金式的葬礼^①和虚伪的姿态不感兴趣。他一心只想行使真正的权力，这就是他为什么没有在今年4月22日与戈林、希姆莱和邓尼茨一道随同大批人员一同撤离地下避弹室的原因。真正权力的唯一来源是希特勒，因此

^① 维金为8至12世纪时劫掠欧洲西海岸的北欧海盗。——译者

他甘愿留下来。他能够听到打字机微弱的跳动声；口述结束了。

一刻钟后，打字声停止了。荣格夫人不动声色地走出书房站在门厅里，她四处寻视，与元首的侍从海因兹·林格的目光相对。她朝他客气地点点头，示意要他进去；然后她就离开希特勒的私室回到自己的宿舍里。只有鲍曼注意到了他们交换的眼神，但是当林格片刻之后走出来时，鲍曼起身走进了书房。

希特勒坐在办公桌前，脸色苍白，眼睛里充满了泪水，就象服用了麻醉剂一般。鲍曼直挺挺地站在他面前，直到他无力地挥动了一下手臂示意要他坐下。荣格夫人打出的文件就放在桌子上，他神经质地整理着文件，把它们分成了三叠。

“这是两份文件。”希特勒看也没看他一眼就开始数起了页数。

“各有三份副本，是我的私人和政治遗嘱。”他抬头盯着鲍曼。“其中一份与你直接有关。”

鲍曼低下头。“我懂了，元首。”

“这些文件要由你和其他几个人作证，我希望立即把这些文件送交舒埃纳尔陆军元帅和在普洛恩司令部里的邓尼茨海军元帅。”他停顿了一下，抹去前额上的一些汗水，鲍曼看见他的手在颤抖。“你明白吗，鲍曼，把这三份副本交给舒埃纳尔和邓尼茨是至关重要的。”他原有的力量有些回复，双眼瞬间闪现出光辉。“至关重要！”

鲍曼已经作出决定。“我认为最好选派约翰迈耶少校去舒埃纳尔那里。他战绩卓著、足智多谋。”他还知道因为约

翰迈耶是希特勒的军事副官，派他去定会 使希特勒 心满意足。

希特勒点头同意。“对，对，约翰迈耶能胜此任……他会送到的。”

鲍曼是个彻头彻尾的实用主义者。他知道柏林已被俄国部队围得水泄不通，约翰迈耶突围出去的可能性极小。尽管他自己的逃跑路线也很危险，但却比较容易成功，而且万一被俘，他还可以求助于一些名人，那是一批作为人质被关押在巴伐利亚的盟军高级俘虏。此外他还独自掌握着一笔为党卫队老兵组织存储的资金；这笔资金从三十年代起就开始积存，由纳粹党的官员出资，通过一些伪装巧妙的公司存入一家瑞士帐户，现在已达数百万镑之巨。鲍曼无需为自己的将来忧虑；至于约翰迈耶……他不知道，也不想知道，可他还是肯定地点头。“是的，约翰迈耶少校是个好人。”

希特勒目光犀利地看着他。

“邓尼茨呢，你打算派谁去？”

“我想其余的两份副本都该给他送去，这样即使有一份被截获，另一份也有可能送到。”

他等待着希特勒的反应。

“是的，这很好，可是派谁呢？”

鲍曼踌躇片刻。“我的私人顾问，山德尔——，还有海因兹·洛仑兹，他作为戈培尔的代表。”

后面这一选择很巧妙，这意味着他自己和戈培尔之间平分权力。事实上完全不是这样。戈培尔已经决定自杀了，鲍曼是知道的。

希特勒似乎感到满意，他疲倦地点点头，“好，我很高兴。今天是个重要的日子，完成了许多事情。”他独自惨然一笑。“我甚至终于作了丈夫。”他朝放在桌子上的文件凝视片刻。“我要让你把这些文件看一看，然后安排人当着我的面作证。现在我得休息一会儿了。”

他费力地站起身来，小心翼翼地护着右腿。鲍曼立刻站起来，但明白不能帮忙。希特勒低头失神似地盯着桌子，然后朝鲍曼瞥了一眼，一声不响地慢慢朝门口走去。

鲍曼朝他的背影喊道，“晚安，元首。”

希特勒在门口停了一下，但是没有回头。门在他的身后轻轻地关上了。鲍曼俯身摸着桌子上的一份文件，回首朝门口扫了一眼，然后坐下开始读了起来。此刻时间是1945年4月29日凌晨4点钟。

这三位信使由一个名叫赫梅里克的下士带路，于4月29日中午离开地下避弹室。他们都带着希特勒的政治遗嘱。希特勒的军事副官约翰迈耶将把一封布格道夫将军写的附件交给舒埃纳尔陆军元帅。另两位信使每人带着一份希特勒的私人遗嘱副本；党卫队军官山德尔要把希特勒的结婚证书送交邓尼茨海军元帅，新闻记者洛仑兹还带着戈培尔的“元首政治遗言的附录”。

这三位信使都溜过了俄军的封锁线并最终到达了英国或美国占领区，但那时欧洲战争已经结束。约翰迈耶回到了威斯特伐利亚伊泽尔隆家中，把文件装在瓶中埋在花园里。

山德尔到了巴伐利亚，改名威廉·保斯丁，并把两份文件藏在一只箱子里放在特格恩西村的一座房子的阁楼里。如

果不是因为新闻记者出身的海因兹·洛仑兹天生行为不检的话，这些文件也许永远不会公诸于世。

1945年的夏天，洛仑兹化名乔治·瑟尔斯前往汉诺威，到英国军管政府去寻求职业，声称自己熟悉地下避弹室的生活。最后他因为携带伪造证件被捕受到拘留。1945年11月，在一次例行的搜查中，缝在衣服衬内的文件被发现。这最终暴露了其他两人，因而所有的文件都被发现了，只有一份例外——鲍曼自己保存着的希特勒的最后一份私人遗嘱。

希特勒私人遗嘱摘录

在斗争的年代，我曾认为我不能承担结婚所给我带来的责任，但是现在，当我生命行将结束之际，我决定与和我有过多年友谊并自愿在柏林被围之时来到这里与我同生共死的女人结婚。她自愿作为我的妻子同我一道死去。这就弥补了由于我为人民服务而进行工作给我们两人带来的损失。

我的所有财物，不论其价值多少，都属于党，如果党不在了，就归国家。假如国家也灭亡了，我就用不着再交待了。

我这些年来所收买的绘画从来没有打算作为私藏，而且完全是为了在我的家乡多瑙河畔的林嗣建立美术馆之用。

我最衷心地希望这一遗愿能完全得到执行。

我指定我在党内最忠实的同志马丁·鲍曼为遗嘱执行人。他被授与完全的法律权利，有权作出一切决定。他可以把所有值得作为私人纪念的东西交给我的亲属，并给他们一笔足够维持一个小资产阶级生活水平的费用；特别是给我的

岳母和他所熟悉的那些我的忠实的男女同事们。

我的妻子同我决定死去，以免遭受被推翻或者投降的耻辱。我希望我们的遗体将在我为人民服务12年来进行大部分日常工作的地方立即火化。

希特勒政治遗嘱摘录

说我或任何其他德国人在1939年要发动战争是不真实的。需要和煽动战争的，完全是那些犹太血统的或为犹太人的利益服务的国际政客。我曾经为裁减军备做出过无数次努力，后代不能把这次战争的责任推到我头上。……

这六年的战争尽管遭受种种挫折，但总有一天会被认为是一个民族争取生存的最光荣、最英勇的表现而载入史册。在六年后的今天，我不能抛弃这个国家的首都。由于我们的兵力太薄弱，因而再也无法抵御敌人的进攻，同时由于我们的抵抗将会被一支疯狂的战争机器所组成的军队逐渐挫败，我要与千百万留守在这个城市里的人们生死与共。而且，我不会落到敌人手中。我知道他们正需要一只新的猴儿由犹太人展览，以取悦他们歇斯底里的群众。因此我决定留在柏林，在我认为元首与总理的府邸已经不能守住的时刻，以身殉国。……

希望我们的陆军军官将来像我们的海军那样，把决不放弃一城一地看作是荣誉攸关的问题；尤其重要的是，指挥官们必须作出光辉的榜样，克尽职守，死而后已。

在我去世以前，我将前帝国元帅赫尔曼·戈林开除出党，

并剥夺1941年6月20日命令中以及我在1939年9月1日国民议会演讲中授予他的一切权力。我任命邓尼茨海军元帅为德国总统和武装部队最高统帅。

在我去世以前，我将前党卫队全国总队长兼内政部长海因里希·希姆莱开除出党并革除他的一切职务。我任命卡尔·汉克省长为党卫队全国总队长兼德国警察总监，任命保罗·吉斯勒省长为内政部长。

戈林和希姆莱不仅对我不忠，还瞒着我，违背我的意志与敌人私自谈判，并非法地企图夺取国家权力，从而给国家和全国人民带来了无法弥补的耻辱。

最后，他们（邓尼茨海军元帅和新政府）必须竭尽全力拥护种族法律，无情地打击一切民族的毒害者国际犹太人。

戈培尔的“元首政治遗嘱的附录”

元首已经命令我，一旦帝国的防御崩溃，就离开柏林到他所任命的政府里去担任领导职务。

我一生中还是第一次必须坚决拒绝服从元首的命令。我的妻子和孩子们也同我一起拒绝服从。在最危急的时刻抛弃元首，实为人情和忠贞所不许；何况在今后余生中，世人将把我视为可耻的卖国贼和下贱的无赖，我不仅会失掉自尊心，还将失去同胞们对我的尊敬，这一尊敬在我力图进一步塑造德意志民族和国家的未来时是必不可少的。

在战争最危难之际，当元首被叛逆的梦魇缠绕之时，少不得要有一个人无条件地陪着他直到最后牺牲，即使违背了

他在政治遗嘱中发出的正式的和（实质上）完全正确的命令，也在所不惜。

因此我相信我在为德国人民的前途做一件最有益的事情。在今后艰苦的岁月里，树立榜样比活着更重要。将来总会有人将一个民族引向自由之路，但是，如果没有彰明昭著的榜样，就不可能重建我们民族的生活。

基于这种理由，我同我的妻子一起，并代表我们的儿女（他们太小了，还不能表示他们的意见，如果他们的年龄比现在大一些，也会毫无保留地同意我们的决定）表示坚定的决心：即使帝国首都沦于敌手也不离开它，而要在元首的身边结束我的生命。因为如果我不能生活在元首的身边并为他服务，生命对我个人来说是没有任何价值的。

柏林

1945年5月1日夜間

弗雷德里希大街上燃起了熊熊烈火，条条黄色的火舌从被熏黑的窗口喷发而出，正在销毁吞噬着街道两侧的建筑。所剩无几的残破不全的玻璃映照着被摧毁的城市。围绕着总理府废墟的最后一道狭窄的环形防线周围到处都在激战。

惊心动魄的枪炮声时而被奇特的短时沉寂代替，好象每个人都停下手来倾听着。城里充满了硝烟味和臭气，可是大多数人漠然不觉只是感到恐惧。

这时，地下避弹室里的人们都已经逃走，只剩下了克莱勃斯将军、布格道斯将军和因被炸弹炸伤无法走路的党卫队指挥官施德尔。他们决定留下，从此再无音信。

逃跑的一小群人从地下避弹室里出来，一个接一个地在忽隐忽现的街道暗影里穿过道道火舌，每当听到机枪射击或炮弹爆炸的声音时，他们就扑倒在地上。他们到达了威登达玛大桥，桥北端有一道向外突出的反坦克路障，对面是正在向前推进的俄军。他们几次试图越过大桥，但都被俄军的猛烈炮火赶了回来。几辆德军坦克轰隆隆地开到桥南端奉命过桥，领头的坦克在路障中冲开一道缺口，其他几辆很快尾随而过。这一群人散开跟在领头的坦克后面，向前行进了大约三百码，到达了泽格勒街。

那辆坦克轰隆一声被一颗反坦克炮弹炸得四分五裂。肯普卡一时间什么也看不见了；比茨和阿克斯曼受了伤；鲍曼和施登菲格被爆炸的气浪掀倒在地上，却奇迹般地没有受伤。他们又退回大桥。刚才他们还试图呆在一起，其中包括鲍曼、瑞曼、施瓦格曼、阿克斯曼、拉什和另外一个人，但是现在只能各顾各了。

鲍曼和施登菲格开始沿因瓦利登街向东朝斯德蒂纳车站走去。现在他们加快了脚步；鲍曼明白争取时间是逃脱的关键。他们走到大桥和铁路的交叉处停下脚步，每当爆炸的闪光映亮了天空时他们就朝暗影处盯看。他们听见有人在他们刚刚离开的门口朝他们轻声呼喊。鲍曼转过身，认出是一个同他们一起逃出地下避弹室的党卫队准尉。他只看见一支鲁格尔手枪的枪口火光一闪，但是没有听见声响，那颗子弹已经击中他的胸部穿过心脏从背部飞出，留下了一个裂开的伤口。鲍曼立时毙命，哼都没有哼一声就倒在地上。施登菲格扬起一只手想保护自己，但是同样立刻一声不响地丧了命。那人把鲁格尔手枪放回枪套，俯身从鲍曼的口袋里取出了希特勒政治遗嘱的最后一份副本。他简单地查看了一下，然后继续搜寻，终于找到了一个用油布包着的棕色信封。他打开信封检查里面的文件。那是一份包括密码在内的关于党卫队老兵组织资金账目的文件。他小心翼翼地把它放回信封，并重新用油布包了起来。然后他尽量擦去鲍曼身旁的黑色皮大衣上的血污并把它扒下来，他把大衣穿上，遮盖住了自己的党卫队制服并仔细地把两个信封分放在两个大衣口袋里。他离开门口，爬过墙上的一个豁口，悄悄地沿路基爬上

了铁路。已是午夜时分了，如果他要使用鲍曼的逃跑路线，就必须在四个小时之内赶到哈维尔湖。

有好几次他觉得听到有人说话的声音，但是他一刻也没有停步。他沿着铁路向北，然后向西穿过夏洛登堡区，小心翼翼地以最快速度前行。他来到了横跨斯勃利河的铁路桥，仍然没有人阻拦。他知道左边是阿道夫·希特勒广场，但是一直走到斯潘多尔公路的边上他才离开铁路。他停下来等待一辆俄军坦克轰隆隆地开过去，然后越过宽阔的路面，轻而易举地穿过运动场向帝国体育场跑去。当他向前跑时，鞋子踩在湿漉漉的草地上发出扑扑的轻响使他想起七年前参加的一次赛跑，那时他还不满15岁。他似乎仍然能够听到当他代表希特勒青年团绕体育场飞跑时观众的喝彩声。可是现在却时过境迁，这一次他是在逃命。

他扑倒在地上，前面有说话的声音。他仔细听着，是德国人。他轻轻地喊了一声，但是没有人回答。他又喊了一声，这一次有了回答声，是一个由于害怕而紧张、几乎是姑娘般的尖声。他沉着自信地和他们说着话，竭力减轻他们心头的恐惧，然后，他慢慢地把双臂举过头顶，站起身来，朝他们走去。

这是三个男孩子，是据守皮彻尔斯道夫大桥的希特勒青年营的战士，他们仍然在毫无指望地等待着温克的援军从南边出现。他们带他去见营长，营长只看了一眼希特勒的遗嘱就给予了他所需要的一切合作。一切都像他所希望的那样，营长自然而然地以为他就是鲍曼，因为他们一直在期望着鲍曼，而来人出示了预定的识别物。而且大多数德国人对

于鲍曼只有一种模模糊糊的印象；他一直避免在大庭广众之下出头露面，而且几乎从来不许别人给他照相，只有一次例外，那是一次纳粹领导人合影，他站在后面，照片上他的面容模糊不清。

现在是凌晨3点30分。五分钟以后他便乘上一条划艇向哈维尔湖南端的一个叫普弗恩尼斯勒的小岛划去。加图就在他左边的西岸上，那是柏林唯一还没有落入俄国人手中的机场。他得向前划三英里。他不停地划着，但并不耗尽体力。船桨已被包了起来，但是桨杈在枪炮声偶然间歇时还是发出了吱吱的响声。有一两次他听到右岸远处传来俄国人说话的声音，他便停桨滑行直到感觉安全时再继续往前划。到四点钟时小岛已经隐约可见了，这时他便悄然躲进小岛的暗影里静静地等待。

飞行员知道天一微明成功的微弱希望就会消失，因而一刻也没有耽误。他驾驶着三引擎的荣——52飞机钻出低矮的云层，熊熊燃烧的城市突然出现在下面。很难找到路标，但是他已经往这里飞过三次了，因此他清楚地知道自己所处的位置。

飞机的下方是通往波茨坦的公路，前面不远就是哈维尔湖。飞行员小心翼翼地降低了飞机的高度；当他在湖水上方水平飞行时看到一艘停泊在东岸的轮船正在燃烧，火光把湖面映照得亮如明镜，他长长地松了一口气。

他已经能够辨清湖面上映出的飞机影子了。这时他十分感谢沿岸的火光，这使他完成任务容易了许多。飞机的浮舟触到了水面，他迅速刹住，把机头转向来路。小岛就在左前

方。他几乎立刻就看见了向他疾速划来的划艇中的人影。飞机的马达声已经引起了俄国步兵的注意，湖两岸零星地朝他开了火。

飞行员调小了发动机的声音，以便使俄国人难以辨清他的位置，他大声向领航员下达命令，警告他有小船正在靠近。他看到那个身着黑色皮大衣的人影熟练地弯腰把桨推入水中，小船很快就绕过飞机的左翼。他感到自己能够听到飞机的浮舟和什么东西磨擦的声音；然后一声巨响把一团大火球猛地抛向空中。夜空刹时亮如白昼，几乎就在同时，俄国人发现了目标，子弹嗒嗒地击中了波纹状的金属机身。他朝领航员大声叫喊着，听到了他那闷声闷气的回答和砰的一声关机门的声音。留在湖面上的空船开始从飞机侧面随波漂走，他再也没有拖延。

三台引擎开足了马力，他借着小岛的掩护，尽力寻找着掩蔽物，驾驶着荣——52号沿湖向前驶去，然后勉强把飞机拖向湖南端的万泽上空。湖水从浮舟上往下流；然后飞机钻入云层，倾斜着转弯向北朝雷克灵飞去。当时的时间是1945年5月2日凌晨4点10分。

从1945年4月25日起，柏林就已经完全落入俄军的包围中了，而市里围绕总理府的环形防线只不过是一个逐渐缩小的袋形阵地。

然而，在4月29日、4月30日和5月1日这三天的时间里，总理府下面的地下避弹室却一直被希特勒和所谓的“帝国总理府集团”占据着。下面是设法逃离地下避弹室或柏林的人员名单。